

季羨林

自述：

我这一生

| 图文版 | 下册 |

季羨林 / 著

中国书店出版社

—图文版—

季羨林自述：

我这一生 (下册)

季羨林 / 著

孟昭毅 / 选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季羨林自述：我这一生 / 季羨林著；孟昭毅选编。

—2版. —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11.7

ISBN 978-7-5153-0088-7

I. ①季… II. ①季…②孟… III. ①季羨林(1911~2009) - 自传

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5312号

原版责任编辑：冈 宁

本版责任编辑：王飞宁

装帧设计制作：瞿中华

本书所用照片由季承先生提供

出版发行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

邮政编码：100708

网址：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：(010) 57350501

门市部电话：(010) 57350370

印刷：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660×970 1/16

印张：42.75

插页：52

字数：600千字

版次：2008年6月北京第一版 2011年8月北京第二版

印次：2011年8月河北第7次印刷

印数：42001 - 49000册

定价：68.00元(上、下册)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：(010) 57350337

—
上册 / 目录
—

我的心是一面镜子（代序）_001

—
一、朦胧的童年岁月 _027

029_ 1. 我的童年

036_ 2. 回忆一师附小

039_ 3. 回忆新育小学

056_ 4. 小姐姐

059_ 5. 彭家四姑娘

060_ 6. 兔子

065_ 7. 红

071_ 8. 老人

078_ 9.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

—
二、难忘的中学时光 _087

089_ 1. 回忆正谊中学

096_ 2. 回忆北园山大附中

111_ 3. 回忆济南高中

119_ 4. 观剧

124_ 5. 遇上日本兵

—

三、勤奋的大学时代 _129

131_ 1. 北大入学考试

132_ 2. 报考大学

135_ 3.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

141_ 4. 受用终生的两门课

143_ 5. 清华园日记（摘编）

—

四、短暂的教学实践 _185

188_ 1. 校长

188_ 2. 教员

191_ 3. 上课

192_ 4. 我同学生的关系

193_ 5. 我同校长的关系

194_ 6. 我的苦闷

195_ 7. 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剧

196_ 8. 天赐良机

—

五、漫长的留学生涯 _197

199_ 1. 留学热

202_ 2. 天赐良机

204_ 3.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

207_ 4. 满洲车上

209_ 5. 在哈尔滨

213_ 6. 过西伯利亚

217_ 7. 在赤都

220_ 8. 初抵柏林

- 228_ 9. 哥廷根
- 230_ 10. 道路终于找到了
- 236_ 11. 怀念母亲
- 238_ 12. 两年生活
- 242_ 13. 章用一家
- 246_ 14. 汉学研究所
- 248_ 15.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
- 251_ 16. 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
- 257_ 17. 大轰炸
- 260_ 18. 在饥饿地狱中
- 263_ 19. 山中逸趣
- 266_ 20. 烽火连八岁 家书抵亿金
- 269_ 21. 我的老师们
- 275_ 22. 学习吐火罗文
- 280_ 23. 我的女房东
- 285_ 24. 反希特勒的人们
- 287_ 25. 伯恩克 (Boehncke) 一家
- 290_ 26. 迈耶 (Meyer) 一家
- 292_ 27. 纳粹的末日——美国兵入城
- 299_ 28. 盟国
- 300_ 29. 优胜记略
- 302_ 30.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
- 306_ 31. 别哥廷根
- 311_ 32. 赴瑞士
- 314_ 33. 在弗里堡 (Fribourg)
- 320_ 34. 同使馆的斗争

323_ 35. 从瑞士到法国马赛

325_ 36. 船上生活

328_ 37. 西贡二月

332_ 38. 从西贡到香港

335_ 39. 回到祖国的怀抱

—

下册 / 目录

—

—

六、坎坷的北大经历 _339

341_ 1. 海外归来

343_ 2. 思想斗争

344_ 3. 终于找到了出路

347_ 4. 陷入会议的旋涡中

349_ 5. 批判的狂潮汹涌澎湃

352_ 6. 政治运动（1957—1965）

355_ 7. 我的学术研究

—

七、痛苦的“文革”记忆 _357

359_ 1. 从社教运动谈起

362_ 2. 1966年6月4日

370_ 3. 对号入座

374_ 4. 快活半年

382_ 5. 自己跳出来

391_ 6. 抄家

399_ 7. 在“自绝于人民”的边缘上

407_ 8. 千钧一发

415_ 9. 劳改的初级阶段

425_ 10. 大批斗

431_ 11. 太平庄

437_ 12.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

440_ 13. 牛棚生活（一）

452_ 14. 牛棚生活（二）

464_ 15. 牛棚生活（三）

472_ 16. 牛棚转移

477_ 17. 半解放

482_ 18. 完全解放

490_ 19. 余思或反思

—

八、收获的二十年间 _499

501_ 1. 1978—1993年

502_ 2. 我的学术总结

511_ 3. 我与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的翻译

526_ 4. 我与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的研究

531_ 5. 我和佛教研究

537_ 6. 我和外国文学

543_ 7. 写作《春归燕园》的前前后后

549_ 8. 我和北大

—

九、幸运的老年生活 _555

557_ 1. 八十抒怀

560_ 2. 新年抒怀

- 566_ 3. 赋得永久的悔
- 571_ 4. 我的母亲
- 573_ 5. 我的父亲
- 574_ 6. 我的妻子
- 576_ 7. 三个小女孩
- 581_ 8. 百年回眸
- 584_ 9.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
- 589_ 10. 九十抒怀
- 597_ 11. 故乡行
- 617_ 12. 九三抒怀
- 622_ 13. 辞“国学大师”
- 623_ 14. 辞“学界（术）泰斗”
- 623_ 15. 辞“国宝”
- 631_ 16. 我的座右铭
- 632_ 17. 九十五岁初度
- 635_ 18. 笑着走

—

附录：季羨林年谱 _637

—

跋：百岁老人的道德文章 _644

—

编者手记：与大师面对面 _649

—

后记：超越九五的岁月 _653

六、坎坷的北大经历

过了至多一个星期，汤用彤先生告诉我，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，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。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。要说不高兴，那是过分矫情；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，那也很难说。我感愧有加，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。不管怎样，副教授时期之短，总可以算是一个记录吧。

1. 海外归来

我于1945年秋，在待了整整10年之后，从哥廷根到了瑞士，等候机会回国；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，于1946年春夏之交，经法国马赛和越南西贡，又经香港，回到祖国。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。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，津浦铁路中断，我有家难归。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，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、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（用彤）先生接受，来北大任教。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，我一点收入都没有。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。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、万分难得的宝物。但因为受了点骗，只卖了10两黄金。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，寄回济南家中。家中经济早已破产，靠摆小摊，卖炒花生、香烟、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，勉强糊口。对于此事，我内疚于心久矣。只是阻于战火，被困异域。家中盼我归来，如大旱之望云霓。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，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！家中的双亲——叔父和婶母，妻、儿正在嗷嗷待哺哩。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。住宿，在上海是睡在克家家中的榻榻米上；在南京是睡在长之国立编译馆的办公桌上，白天在台城、玄武湖等处游荡。我出不起旅馆费，我还没有上任，根本拿不到工资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无书可读，无处可读。我是多么盼望能够有一张哪怕是极其简陋的书桌啊！除了写过几篇短文外，一个夏天，一事无成。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。古人说：“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

光阴。”我自己常常说，浪费时间，等于自杀。然而，我处在那种环境下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真成了“坐官”中的杨四郎。

我于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，先到秦皇岛，再转火车，到了一别11年的故都北京。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，尚能通车。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。汽车经过长安街，于时黄昏已过，路灯惨黄，落叶满地，一片凄凉。我想到了唐诗“落叶满长安”，这里的“长安”，指的是“长安城”，今天的“西安”。我的“长安”是北京东西长安街。游子归来，古城依旧，而岁月流逝，青春难再。心中思绪万端，悲喜交集。一转瞬间，却又感到仿佛自己昨天才离开这里。叹人生之无常，嗟命运之渺茫。过去11年的海外经历，在脑海中层层涌现。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，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。

按北大当时的规定，国外归来的留学生，不管拿到什么学位，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。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，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。至少要等上几年，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，如够格，即升为正教授。我能进入北大，已感莫大光荣，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！第二天，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。汤先生是佛学大师。他的那一部巨著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集义理、辞章、考据于一体，蜚声宇内，至今仍是此道楷模，无能望其项背者。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。在我的想象中，他应该是一位面容清癯、身躯瘦长的老者；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：他身着灰布长衫，圆口布鞋，面目祥和，严而不威，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。过了至多一个星期，他告诉我，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，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。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。要说不高兴，那是过分矫情；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，那也很难说。我感愧有加，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。不管怎样，副教授时期之短，总可以算是一个纪录吧。

2. 思想斗争

我在这里讲的“思想斗争”，不是后来我们所理解的那一套废话，而是有关我的学术研究的。我曾多次提到，在印度学领域内，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，特别是在“混合梵文”上。上述我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写的几篇论文可以为证，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。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。在哥廷根10年，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，只有一回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，可见其收藏之富。反观我国，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，然而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，则几乎是一片沙漠。这个问题，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。我的所谓“思想斗争”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。

我虽少无大志，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，就像是过河卒子，只能勇往向前，义无反顾。可是我要搞的工作，不是写诗，写小说，只要有灵感就行，我是需要资料的，而在当时来说，只有欧洲有。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，顺彼失此，顾此失彼，“我之进退，实为狼狈”。正像哈姆雷特一样，摆在我眼前的是：走呢，还是不走？That is a question. 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，想到祖国在灾难中，在空前的灾难中，我又是亲老、家贫、子幼。如果不回去，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、失掉了人性的人。如果回去，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。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：先接受由G. 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，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，再返回欧洲，从事我的学术研究。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。

一回到祖国，特别是在1947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12年的济南以后，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，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，我立即忍痛决定，不再返回欧洲。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，我为人子、为人夫、为人父的责任，必须承担起来。我写信给Haloun教授，告诉了他我

的决定，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。有关欧洲的“思想斗争”，就这样结束了。

然而新的“思想斗争”又随之而起。我既然下定决心，终生从事研究工作，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“马行在夹道内，难以回马”。研究必有对象，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，可望而不可即了。新的对象在哪里呢？我的兴趣一向驳杂，对好多学问，我都有兴趣。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。只因有了困难，才产生了“思想斗争”。这个掂一掂，那个称一称，久久不能决定。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：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，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充足。离开了印度，则我10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。资料不够充足，研究仍会遇到困难。我的考虑或者我的“思想斗争”，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。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，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。“斗争”没有结果，就暂时先放一放吧。

3. 终于找到了出路

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。校长办公室则在子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内，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。所谓“秘书长”，主要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，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。秘书长以外，还有一位教务长，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。没有什么副校长。全校有6个学院：文、理、法、农、工、医。这样庞大的机构，管理人员并不多，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：校长一走廊，处长一讲堂，科长一操场。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，但是，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。

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，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。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，放在我的研究室中。我了解到，这都是出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的厚爱。现在我

在日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种情况，中国的大学，至少是在北大，则是不见了。这样做，对一个教授的研究工作，有极大的方便。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，帮我整理书籍。马理是已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，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。

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。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，却如凤毛麟角。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，比较起来，稍有优越之处，但是，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，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。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方典籍的，可是这情况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知道的，新中国成立前，我毫无所知。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，但是同欧洲和日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，真如小巫见大巫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真如虎落平川、龙困沙滩，纵有一身武艺，却无用武之地。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，却是一筹莫展。我搞了一些翻译工作，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，翻译了德国女作家安娜·西格斯的短篇小说。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写成的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，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译稿，后来由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理出版，收入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中。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兴趣之所在，不过略示一下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已。

这远远不能满足我那种闲不住的心情。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，教员不过5人，学生人数更少。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，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。我开了一班梵文，学生只有3人，其余的蒙文、藏文和阿拉伯文，一个学生也没有。我“政务”清闲，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里对面枯坐，既感到极不舒服，又感到百无聊赖。当时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，学校也差不多，有一个教授会，不过给大家提供见面闲聊的机会，一点作用也不起的。

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《魏晋玄学》。我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。他的著作虽已读过，但是，我在清华从未听过他的课，极为憾。何况魏晋玄学的研究，先生也是海内第一人。课堂就在三楼上，我当然不会放过。于是征求了汤先生的同意，我每堂必到。上课并没有讲义，他用口讲，我用笔记，而且尽量记得详细完整。他讲了一年，我一堂课也没有缺过。汤先生与胡适之先生不同，不是口若悬河的人。但是他讲得细密、周到，丝丝入扣，时有精辟的见解，如石破天惊，令人豁然开朗。我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，只是“只在此室中，书深不知处”了。此外，我因为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的知识欠缺，周祖谟先生适开此课，课堂也在三楼上，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听。周先生比我年轻几岁，当时可能还不是正教授。别人觉得奇怪，我则处之泰然。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，北大恐尚未有过，但是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能者为师。在学问上论资排辈，为我所不取。

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还没有解开：旧业搞不成了，我何去何从？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，因为觉得有兴趣，曾随手从《大藏经》中，从那一大套笔记丛刊中，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“比较文学史”（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）的资料。当时我还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，虽然在下意识中觉得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，非常值得去做的。回国以后，尽管中国图书馆中关于印度和比较文学史的书籍极为匮乏，但是中国典籍则浩瀚无量。倘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，至少中国这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，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同印度沾边，不致十年负笈，前功尽弃。我反复思考，掂斤播两，觉得这真是一个极为灵妙的主意。虽然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，但目前也只能顺应时势，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。

我终于找到了出路。